

制度扭曲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再考察*

时磊

(扬州大学商学院,江苏扬州 225127)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和缺陷,该文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初期的动力是技术模仿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为了更好进行技术模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构建了大量扭曲性经济制度,改变要素价格导向,促进技术模仿,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进入中期后,经济增长动力转变为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但扭曲性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粘性,产生许多不合宜的经济结果。我们将中国经济发展初期技术模仿路径区分为“简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相应的经济制度构建包括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和“农民工制度”,政府信誉注入银行体系和地方政府干预等;技术模仿导向经济制度构建促成了“中国增长奇迹”。但随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经济发展早期构建的经济制度开始产生负面经济增长效应,供给体系质量提升亟待清理扭曲性经济制度。

关键词: 供给体系质量提升;技术模仿;扭曲性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 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18)89-0031-07

引言

起始自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启动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之路,仅仅40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取得令举世瞩目的长足进步。不能否认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缺陷,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中共十九大报告针对经济发展和增长动力问题的表述为“供给体系质量还不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高品质产品供给能力不足;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新兴产业全球竞争制高点掌控不足;供给体系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有待提高等。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一方面表现为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存在诸多的困局和弊端,这种“冰火两重天”式的经济发展格局的形成逻辑又是什么?这

是本文的研究核心。

这篇文章提出一种核心的逻辑分析框架:中国经济发展初期的核心动力是技术模仿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为了更好进行技术模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构建了大量的扭曲性经济制度,这些扭曲性经济制度改变了要素价格导向,促进了技术模仿,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但经济发展进入中期以后,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转变为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构筑新的适应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制度,但是扭曲性经济制度具有很强的粘性,短期内的改变是比较困难的,这种扭曲性的经济制度产生了许多不合宜的经济结果。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经济增长的解释可以兼顾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实现高速增长的“奇迹”,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诸多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突出问题,这一逻辑分析框架也为理解和解决当前的中国经济困局提供了一些思路。这篇文章中的经济制度扭曲主要是指要素市场扭曲。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机制是什么呢?Solow(1956)发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可能主要是非要素投入因素,文献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但是可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也是不同的,现有实

收稿日期:2018-10-20

作者简介:时磊,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劳动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等方向的研究。E-mail:shilei@yzu.edu.cn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途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8BJL044。

证研究证实,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主要是研发和创新(如 Xu and Chiang, 2005),而后发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主要是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如林毅夫、张鹏飞, 2006),技术扩散的途径主要有:专利扩散、国际贸易尤其资本品贸易、FDI等(Keller, 2001)。我们可以将经济发展阶段区分为初级阶段和中高级阶段,相对应的初级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主要是技术模仿,中高级阶段则主要转向技术创新,当然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于和本文研究目的关系不大,不进行进一步区分。与此同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可能需要相应不同的“适宜(经济)制度”。

为什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需要不同的经济制度呢?这可能是由于要素供给和技术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例如,金碚(2006)指出,中国能源结构主要是规模巨大的煤炭而缺乏石油,自由市场环境企业没有激励引进大量使用石油的技术。Gerschenkron(1962)强调,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使用扭曲性经济制度会有利于技术模仿,加快增长收敛,这些制度包括做大企业规模、紧密银企关系和政府干预等。Acemoglu、Aghion and Zilibotti(2006)认为,当技术创新成为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时,则需要采用分散化的生产组织,提高经济制度灵活性和竞争性,充分使用本国要素构筑新的技术。他们将后发国家“因循追赶型”经济发展采取社会组织结构称之为“以投资导向为战略的”,而先发国家经济发展采取的社会组织结构则是“以创新导向为战略的”。两种制度构成微观基础的核心不同在于前者目标是最大化投资能力,而后者核心目标在于做出正确决策,发展更好的技术,经济制度应当更加灵活遴选优秀经理人、倾向优胜劣汰。

在此基础上,这篇文章将通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回顾梳理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中国经济发展初期为了更快学习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构建了要素市场扭曲为核心的扭曲性经济制度,这些扭曲经济制度改变了要素价格导向,促进了微观企业采用技术模仿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但经济发展进入中期以后,要素价格扭曲导致了企业不愿意

也没有能力去从事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长陷入了“供给体系质量不高”的陷阱,因此要摆脱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前困境可能最为核心的是进行扭曲性经济制度的改革,尤其是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改变。这篇文章的结构将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围绕“技术模仿引进”导向整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扭曲性经济制度类型,以此解释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增长奇迹”;第三部分分析“技术模仿引进”导向的扭曲性经济制度如何限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由技术模仿向技术创新的转变,以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体系质量不高”提供一个解释;最后部分是结论性述评。

1 扭曲性经济制度与“中国增长奇迹”:经济史的再考察

经济发展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初期,存在着十分重要的“后发优势”,这主要是先发国家已经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发展路径可供学习。但是围绕这种较为成熟的技术发展路径构筑经济制度、动员经济资源禀赋则可能需要完全不同于先发国家的经济组织方式。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动态性,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导致的复杂性,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并不是只有一种类型、一种方式,故而经济制度构建也有着极端的复杂性,为了简化问题处理我们将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97年,这一阶段本文认为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主要类型是学习亚洲“四小龙”的“简单劳动密集型”;第二个阶段是1998~2012年,这一阶段本文认为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主要类型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本文这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主要借鉴了吴敬琏(2013),1998年之后的阶段被他称为“再重工业化”。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例如中国经济的两个核心引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初期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偏“简单劳动密集型”,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则偏“资本密集型”。

“简单劳动密集型”技术模仿是较为容易的,因为这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采用较为自由化的、鼓励竞争的市场经济方法来实现。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中国经济制度构建表

现出明显的“去管制化”的自由化倾向,以劳动力市场为例,改革开放以前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资管制”和“劳动力流动管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之后,由于FDI和民营企业等新工资制度实践者的竞争,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也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工资管制”被消除的一个最为有利的证据是教育回报率的不断上升(李实、丁赛2003;Zhang et. al., 2005),论证过程可参阅时磊、田艳芳(2012)。而“劳动力流动管制”政策在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就有所松动,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增加,甚至形成了“民工潮”,这是“中国增长奇迹”产生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这种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过程中也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扭曲性制度,本文称之为“农民工制度”,即中国户籍制度下在工厂从事工人职位工作的劳动者,却有着一个被制度所定义的“农民”的身份。制度定义的“农民”身份所隐含的收益扭曲了要素的价格。

首先,“农民工制度”构建采用固化的“农民”身份将这一部分劳动者限制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内,可以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例如可以规避劳动力市场监管。最低工资法、新劳动法等劳动力市场监管法律法规针对的主要是较为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而“农民工”或者“进城务工者”这样的制度定义本身就是将这一部分劳动力非正规化,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必然意味着低工资。其次,制度定义的“农民”身份加大了劳动力迁移流动的成本。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设置使得农民缺乏必要的退出机制,农民无法通过出售农村既有权力获得资源退出,内生地出现了家庭内分工的格局,这使得“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成本有一部分在农村,合理工资就会被压缩,通过竞争机制这种低工资得到了传播,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比较优势。再次,对劳动力完全流动的制度限制,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非正规金融和保险机制所依赖的环境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农民仍然可以从传统农业社会中获得非正规制度带来的利益,这会进一步降低农民完全迁移的意愿(Das Gupta, 1987; Banerjee and Newman, 1998)。最终这些都导致了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而低工资、低福利造就的简单劳动力比较优势十分有利于微观企业引进和模仿亚洲“四小龙”发展和创造的“简单劳动密集型”技术。

“资本密集型”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是本文的重要内容,因为这种技术学习是违背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因此从根本上说需要限制竞争的、非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安排来进行生产组织。本文将这种经济发展初期建立的非标准的、限制竞争的经济制度安排统称为“要素市场扭曲”,“要素市场扭曲”的核心目标是要在资本短缺的环境中构建一个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环境,进而使得微观经济主体有足够的激励和动力去主动学习西方成熟技术路径。Gerschenkron(1962)在分析了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将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机制系统总结为:银行体系和政府干预。1990年代经济发展进入中期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以较低的成本筹措足够大规模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再工业化”。如果采用市场化的发展策略发展银行业,首先银行规模小型化会导致大规模资金筹措交易成本上升,其次私人信誉不足必然导致资金筹措规模受到限制。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干预在促进银行业发展方面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向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注入国家信誉。随国家信誉注入中国银行体系,中国的储蓄规模一直非常巨大,大规模资金筹措交易成本迅速下降。这是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的重要原因(麦金农, 1997)。

中国经济发展“要素市场扭曲”的另一个特色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是什么,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之后?陶然等(2009)认为,“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在预算收入中较高的边际分成比例激励了地方政府实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而“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开辟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主要包括新税制下的营业税、所得税,以及新预算外收入,新的收入来源具有的流动性导致地方政府为扩大税基而展开招商引资竞争。第二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影响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资源动员能力从何而来?杨继东、杨其静(2016)认为,《土地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赋予了地方政府享有国有土地开发的垄断权。范剑勇、莫家伟(2014)指出,地方政府不仅通过直接出让国有土地获取资金,更重要的是借助土地抵押从

银行获取贷款,形成地方债务。地方政府既有经济激励,又有资源动员能力,这导致地方政府深入干预要素市场,出现了类似“商业服务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这样同类生产要素却表现出明显的价格“双轨制”的奇特现象。

黄益平、陶坤玉(2011)系统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要素市场扭曲”现象,发现存在着资本市场扭曲、土地市场扭曲、劳动力市场扭曲和能源市场扭曲,通过测算,所有要素市场扭曲中,资本市场扭曲可能是最重要的项目,资本生产者补贴相当于整体生产者补贴的40%。张杰等(2013)指出,在中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金融资源,而民营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盛洪(2012)提供了类似的证据,2001~2009年国有企业承担的利率平均只有1.6%,若国企按照市场利率借贷,那么同期利润的47%将支付利息。“要素市场扭曲”环境中的中国微观企业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多数是技术含量较高、工艺相对复杂的关键零配件,其中所含的工艺秘密、技术诀窍和创新知识,可以通过溢出效应被中国本土企业学习和吸收,这可被归纳为“进口中学习”(巫强、刘志彪,2009)。更为规模巨大的是FDI,以“要素市场扭曲”为手段竞相展开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使得1990年代开始进行全球化资源配置的跨国公司竞相将资本投入中国大陆。“中国增长奇迹”中巨量吸引的FDI,高端资本品进口为特征的加工贸易企业,都是“要素市场扭曲”为核心的模仿引进导向经济制度吸收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逻辑结果。

2 “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的经济制度困境

持续40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导致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边际效益递减,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之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即全要素生产率必然显现出不断衰减的倾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这时候如果可以迅速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跨越,经济社会发展将会重获动力。但是围绕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构建的经济制度的清理可能没有那么迅速,依据青木昌彦(2001),经济制度是社会制度博弈的参与人之间的

策略互动最后成为自我实施的结果,可以称之为“博弈的均衡”。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是对人们行为进行制约的人类自身设计的规则;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制度又是人类社会内生的、社会博弈参与人之间策略互动从而最终自我实施的均衡结果。因此,经济制度的变革可能需要社会制度博弈的参与人之间反复的策略互动才能够完成,这既需要时间又需要必备的程序。经济制度变革表现出的明显的“粘性”必将反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

“简单劳动密集型”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农民工制度”等经济制度设置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创造主要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的巨量创造会降低人们的受教育激励,2004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就开始出现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民工荒”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结构非均衡,接受教育却无法找到合意工作显然会影响微观主体的教育投资决策。伊斯特利(2005)写道,“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普及教育并不能产生投资激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教育的质量因投资激励的不同而异。”“在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将会努力地学习,家长的督导更严格,教师的压力也更大。”中国高等教育虽然经过了巨大的规模扩张,但近些年来教育质量一直受到人们的诟病,这可能与劳动力市场困境引发的激励不足紧密相关。

而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由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向技术创新转变可能需要越来越多的技能劳动力,接受高教育的高质量劳动者。依据现有文献,我们认为技能(skill)可以被定义为“已被开发出来的有利于学习或更快学习知识的潜质”或者“指人们在既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执行某一任务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可学习的”(黄玖立等,2014)。但中国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制度诱发了产业技术结构锁定于“简单劳动密集型”,这阻碍了技能劳动力进入企业部门并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相应的制度扭曲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提供出更符合产业要求的技能员工。虽然自1999年中国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大学扩招,接受高教育的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有了根本性的增长,实现了劳动力市场较为明显的结构升级,但是这种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红利被具有“粘性”的制度设置所阻碍,无法产生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

“资本密集型”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银行体系、政府干预等经济制度设置也具有较为明显的技术创新阻碍效应。以银行体系为例,李扬(2014)发现,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中国金融体系动员储蓄的能力已经相当强大。但是,在资金供给方面,以银行为绝对主导的金融结构所动员起来的资金,在期限上偏短;而在资金需求方面,由于工业化深入发展和城镇化不断推进,我们对长期资金的需求甚殷,技术创新明显需要长期资金。不仅如此,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只能以增加债务的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这种“权益错配”,在推高微观主体负债率的同时,也使得企业承担了更大的、潜在的债务风险,降低了创新激励。而且“要素市场扭曲”价格环境导致了一种较为明显的激励扭曲现象,以资本要素为例,由于存在价格“双轨制”,一条轨道是可以较为廉价获取金融资源,主要是中长期债务,金融资源的主要来源是正规金融机构;另一条轨道则是获得成本较为昂贵,主要债务类型是短期债务,获取主要来源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由于“双轨制”的存在,获取长期债务较多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双轨间套利的方法获得较高的回报,据非正式估算,正规部门获取金融资源价格与民间金融资源获得间的价格差额在2011年竟然高达13%以上。

新时期以来“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问题凸显让人们越来越多地反思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一个较有共识性的结论是,扭曲性经济制度的根源可能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干预性的经济制度。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长期以政府替代市场、以政府管理替代社会治理,不仅仅引发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扭曲,而且竞争性经济制度建构的缺失也无法化解经济社会动态化带来的利益重构。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使得政府机构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技巧日渐娴熟,但与此同时社会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更与日俱增,以政府机构替代市场和社会的组织方式越来越显得运转成本高企。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陈剑估计,到2014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已超过6400万,财政供养比已经高达23:1。更为问题严重的可能是地方政府,其可支配财力只能勉强维持政府部门和相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发放和基本功能运转,为了获取足够经济社会发展资源,以

大量低效率的地方国有企业为投融资平台,以国有土地征用、出让和抵押为手段获取大量的非体制性债务,这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风险来源。地方政府机构运转成本高企引发的“高税负-高债务-通缩”组合风险,加上政府机构为获取经济发展资源而设置的“要素市场扭曲”较为显著地降低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张杰、金岳,2016)。

即使付出了相当的社会经济代价,地方政府机构的管理效率面对与日俱增的社会动态性和复杂性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边际效益递减。例如,曾经非常高效的地方政府替代市场机制将土地等生产资料从低效率生产领域转移到高效率领域的手段不再有效了,要素价格重估带来的暴利引发相当多的和涉及面相当广的利益纠纷、利益冲突。地方政府替代市场机制、政府管理替代社会治理使得政府职能出现明显的缺位、错位和越位,因此,本文认为,“供给体系质量提升”所必需的政策和制度方面调整可能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我们认为,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问题,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可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和实践环节,《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实现从发展型全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有限政府的转型,这其中较为关键的一环可能就是清理扭曲性经济制度。

3 结论性述评

201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周年,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逐步由“高速通道”下降进入“中高速通道”,这可能是全面反思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以及其代价的一个良好契机。这篇文章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挑战,与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挑战是有所不同的。许多在早期阶段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发展挑战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是过渡性的、暂时的,而不是长期、全局的最优制度。经济发展进入中期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面临着转换要求,本文主要指的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来源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

的转变。这种转变并非自然而然就可以完成的,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需要不同的“适宜制度”,因此过去40年间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围绕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导向构建的临时性的、过渡性的、限制竞争的扭曲性经济制度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着需要被清理的态势。但经济制度的变革可能需要时间和必要的程序,而且需要深入的研究。

这篇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回顾梳理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逻辑,将中国经济发展初期全要素生产率来源的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路径区分为“简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简单劳动密集型”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经济制度构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去管制化”和“农民工制度”,这些制度建构导致了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形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比较优势。“资本密集型”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的制度建构则主要包括银行体系和政府干预,中央政府将政府信誉注入银行体系加快了银行筹资规模增长,并降低了获得资金的成本,这一切加速了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再工业化”过程。地方政府干预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要素价格体系出现较为普遍的“双轨制”现象,降低了资本投资的要素价格成本加速了微观企业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模仿和技术学习,主要途径是FDI和“大进大出”型加工贸易。但这些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发展挑战的经济制度安排往往只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随着内外部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一些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出现衰减,信息低效、无效及激励不相容的现象频现(田国强、陈旭东,2015)。

依据前文类似框架,本文将经济发展早期构建的经济制度所具有的负面经济增长效应也区分为两种:“简单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简单劳动密集型”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和与之相关的劳动力市场经济制度导致巨量的简单劳动密集型就业创造,降低了人们接受教育的投资激励。而全要素生产率来源转型显然需要更多的能够处理非均衡、非常规情境下产生的诸多问题的技能劳动力,劳动力市场自大学扩招以来实现的结构转型效应不能够真正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动力,主要形成原因可能

就是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导向的经济制度变革“粘性”所引发的产业结构锁定。“资本密集型”技术模仿和技术引进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银行体系、政府干预等经济制度设置也具有较为明显的技术创新阻碍效应。银行体系方面,非竞争经济制度主要结果是以融资结构的“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表现的,“要素市场扭曲”价格“双轨制”导致的套利效应也使得中国许多优势企业没有足够的研发激励。扭曲性经济制度的主要产生原因可能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度干预,因此,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治理边界,可能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和实践环节,但这个过程明显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Acemoglu, Aghion and Zilibotti, 2006, "Distance to Frontier, Sel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4(1), pp. 37-74.
- [2] Banerjee, A. and A. F. Newman 1998, "Information, the Du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65(4): 631-653.
- [3] Das Gupta, M. 1987, "Informal Security Mechanisms and Population Retention in Rural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6(1): 101-120.
- [4] Gerschenkron,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5] Keller, 2001,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NBER Working Papers 857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 [6] Xu and Chiang, 2005, "Trade, Patents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s, vol. 14(1), pages 115-135.
- [7] Zhang, Zhao, Park and Song, 2005, "Economic Return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 1988-2001",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3(4), 730-752.
- [8] Zhao, 1997, "Labor Migration and Returns to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79, No. 4, 1278-1287.
- [9] 范剑勇, 莫家伟. 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北京)[J]. *经济研究*, 2004, 1: 41-55.
- [10] 黄玖立, 冼国明, 吴敏, 严兵. 学校教育与比较优势: 解构作为渠道的技能[J]. *经济研究*, 2014, 4: 172-186.

- [11] 黄益平,陶坤玉. 中国外部失衡的原因与对策:要素市场扭曲的角色[J]. 新金融,2011,6:7-13.
- [12] 李实,丁赛.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2003,6:58-72.
- [13] 李扬. 完善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金融改革议题[J]. 经济研究,2014,1: 8-11.
- [14] 林毅夫,张鹏飞. 后发优势、技术引进与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2006,5(1):53-74.
- [15] 麦金农. 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16]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 [17] 盛洪. 盛洪: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改革.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2(2):36-41.
- [18] 时磊,田艳芳. 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与“知识失业”[J]. 中国人口科学,2012(1):28~38.
- [19] 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 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J]. 经济研究,2009(7):21-33.
- [20] 田国强,陈旭东.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制度转型和国家治理的视角[J]. 学术月刊,2015(5):18-27.
- [21] 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2013.
- [22] 巫强,刘志彪. 中国沿海地区出口奇迹的发生机制分析[J]. 经济研究,2009(6):83-93.
- [23] 杨继东,杨其静. 保增长压力、刺激计划与工业用地出让[J]. 经济研究,2016(1):99-113.
- [24] 伊斯特利.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中信出版社,2005.
- [25] 张杰,金岳. “高债务-高税负-通缩”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困局及破解思路. 江苏社会科学,2016(1):75-82.
- [26] 张杰,刘元春,翟福昕,芦哲. 银行歧视、商业信用与企业发展[J]. 世界经济,2013(9):94-126.

Institutional Distor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Rethinking on the Logic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HI Lei

(Business School,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Province225127, China)

Abstract: After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achieved unpreced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and defects. What is the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i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the impetus of China's earl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echnology imit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imitate the technology, the government have constructed a large number of distorting economic systems. However,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wer of economic growth has changed in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the distorting economic system has a strong stickiness and produces many undesirable economic results. We divide the initial technology imitation path into "simple labor intensive" and "capital intensive"; th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system construction includes "deregulation" and "peasant worker system", and the government reputation injection into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construction has contributed to the "miracle of China's growth".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economic system of early economic development begins to produce negativ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so that distorting economic system needs to be changed desperately.

Key words: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supply system; technology imitation; distorting economic system